中国的近现代史，是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中国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

      重视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注意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这是中国的一个优良传统。毛泽东讲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还发岀过“学一点历史”的号召。邓小平指岀，“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江泽民提出，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胡锦涛说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习近平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中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课之一。主要是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了解中国历史、国情，

      应当达到以下的目的与要求：

      一、了解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人民富裕这两项历史任务；懂得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传统。

      二、了解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进行探索的历程及其教训；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怎样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三、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内外环境，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树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

      四、结合中国革命，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认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五、结合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明确中国近现代历史主题。习近平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不能动摇。”要警惕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一）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

      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在五千年以前，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等地区岀现早期文明社会的要素。四千多年前是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时代。公元前21世纪开始形成王朝国家。早期的王朝是夏、商、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后经历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明、清等朝代。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延续至今的国家，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哲学思想博大精深。

**（二）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

      自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统治阶级从皇帝、贵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很少或者没有土地。

      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常常结合一起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实行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秦始皇开始。

      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还与佛教、道教相互融合。封建统治者吸收法家思想，实行专制统治。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其核心是宗族家长制，突出君权、父权、夫权。中国封建社会，巩固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使其前进缓慢，并造成不可克服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出现过一些“盛世”，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清代的“康雍乾盛世”等，通常岀现在朝代的前中期。随着政治腐败，社会发展逐渐陷于停滞状态，迫使农民举行起义，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社会发展。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也走向封建社会的末世。到了鸦片战争前夜的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衰相尽显。

**（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

      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也随之向外扩张。

      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至18世纪，继英国之后，美国、法国等先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提供政治上保证。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推广到欧美各国的工业革命使大机器生产取代工场手工业。

      殖民主义应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而产生，随着生产方式的演进而发展，是西方列强对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人民的剥削，建立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服务。

      在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殖民主义发展成为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的更完整的世界体系。

      资本主义使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西方资产阶级迫使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来东方是为了把它们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成为殖民地以及附庸。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使中国遇到了挑战。

**二、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19世纪初，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建立了“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国。继占领印度之后，中国成为它的主要的侵略目标。

      英国对华贸易长期处于人超状态，英国工业品遭到中国自然经济和闭关政策抵抗，销量不大，而英国商人购买中国的茶叶、生丝等商品。英国殖民者以走私毒品鸦片作为改变贸易逆差的手段，强迫印度种植鸦片，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走私到中国贩卖。鸦片战争前40年间，英国运人中国的鸦片约有40万箱，从中国掠走了3亿至4亿银元。

      1825年和1837年英国发生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835年，林德赛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子爵建议对中国发动战争。在华鸦片贩子、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曼彻斯特商会和利物浦印度协会等都曾要求动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

      英国的鸦片走私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银贵钱贱，并且毒害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清政府实行禁鸦片措施，特别是钦差大臣林则徐于1839年6月在广东虎门销毁鸦片。1840年4月，英国国会决定对华战争。同年6月，英国侵华舰队封锁了珠江海口和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1843年10月，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1844年7月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10月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

      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侵略特权。如：割占香港岛，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外国船舰可在中国领海自由航行，破坏了领海主权；外国人在华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享受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协定关税，则破坏了中国的关税主权；

      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就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破坏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但帝国主义列强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征服中国，所以通过代理人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帝国主义势力与中国的封建势力、买办势力勾结，镇压革命。近代中国在实际上丧失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的地位，但是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义。它与连名义上的独立也没有而由宗主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有区别，因此称作半殖民地。

      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分离，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了产业工人后备军。一批官僚、买办、地主、商人兴办新式工业。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不容许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利用特权在中国倾销商品，对工业进行经济压迫。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资本及依附于它的官僚资本居于主要和支配的地位。在中国农村中，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优势。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操纵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控制中国政治。

      第二，中国的封建势力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统治支柱。

      第三，中国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保持着。

      第四，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发展缓慢，而且它与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有联系。

      第五，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之下，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在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

      第六，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人民尤其是农民破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扩大，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结合的加深而逐渐形成的。

**（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

      随着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不仅旧的阶级发生了变化，还有新的阶级产生出来。

      旧封建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占有大量的土地，实行专制统治。不过由于城市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动荡，有些地主从乡村迁往城市成为城居地主。一部分地主投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的附股外资企业，有的入股洋务企业，有的创办或参股民营企业，转化为资本家。大多数地主主要依靠地租，一些城居地主兼营土地、高利贷和工商业。

      旧的被统治阶级即农民阶级是近代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被剥削阶级。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向贫农或雇农转化。有些农民破产或失去土地后成为产业工人的后备军。近代中国的农民由于社会地位低下，所以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作为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农民单凭自身的力量不可能求得解放。

      近代新兴的被压迫阶级是工人阶级，是城乡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中国工人阶级最早出现于19世纪40至5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中。它先于中国的资产阶级而产生的。在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创办的大型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以及70年代以后的中国民族企业中雇佣了一批工人。早期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它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三重压迫，革命性最强，是近代中国最革命的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也是近代中国新产生的阶级。它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和刺激下，主要由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投资新式企业转化而成。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兴办的新式企业逐步发展起来。

      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比较复杂，其中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本家。他们是利用政治特权，在剥削劳动人民和挤压民族资本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

      中国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是民族资本家。他们经营的企业由于设备落后，并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未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仍然有联系。商业畸形发展，工业资本家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主体。有的资本家同时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兼营封建剥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表现岀两面性。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既有矛盾、斗争的一面，又有依赖、妥协的一面。

**三、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一）两对主要矛盾及其关系**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其中有：中华民族与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派系的矛盾，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的矛盾。在这些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除了帝国主义割占的地区和直接管理的租界、租借地以外，主要是通过中国政府当局和各地的官僚、军阀来统治中国人民。

      一般来说，当资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中国内部能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这时，民族矛盾特别尖锐，阶级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例如，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反帝运动。当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结成同盟，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压迫中国人民，尤其是封建主义残酷的时候，中国人民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盟。这时阶级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例如，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

**（二）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

      中国人民除了遭受本国封建压迫以外，更遭受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民族压迫。近代中国人民的斗争主要是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

      世界上的主要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都曾经欺凌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直到抗日战争以前，中国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正如毛泽东所说，“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紧密联系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阻碍着技术的进步，必须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这是因为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第一，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改变它们控制中国经济财政命脉；第二，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政治制度；第三，就不可能达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从而进行现代化建设。

      近代以来，爱国人士提出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些主张不能从根本上给中国指明出路。许多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不会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和自己控制的政权，所以以改良的方式是不可能的。近代中国曾有不少人如孙中山希望通过改良的途径挽救中国的危亡，如维新变法运动和立宪运动等，但行不通。

**第一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一、军事侵略**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主要的是进行军事侵略。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许多侵华战争，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例如，1894年11月，日军在甲午战争中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在4天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2万余人。1900年7月，俄国入侵中国东北时，先后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同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在庄王府一处，烧死和杀死义和团团民与平民1700多人。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60年，又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去香港岛对岸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

      1849年，葡萄牙武力强占澳门半岛。1887年，胁迫清政府订立《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允许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

      俄国利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于1858年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之签订《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领土。I860年，通过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领土。186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北44万平方公里领土。1881年，通过《改订伊犁条约》和5个勘界议定书，割去中国西北7万多平方公里领土。俄国共侵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

      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

      1898年，德国强租山东的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沙俄强租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以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山东的威海卫和香港岛对岸的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及附近的岛屿（新界），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1899年，法国强租广东的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把广东、广西、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声明把福建作为其势力范围。

     1845年，英国租得上海外滩附近837亩土地，设立上海英租界。以后直至1911年，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等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福州、重庆等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中国的法律不发生效力，是“国中之国”。

      通过侵华战争，帝国主义列强还获得了在中国领土上驻兵的特权。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等12处“留兵驻守”。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得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有关权益，在旅顺设置“关东总督府”，并派兵驻守。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作“关东军”，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突击队。

      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勒索赔款。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就强迫清朝地方政府交纳广州赎城费600万元（银元）。其后，更通过《南京条约》攫取赔款2100万元（银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各得赔款80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再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共2315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日本用中国的巨额赔款扩充军备，海陆军扩充费及军需工业费等费用占赔款总数的85%，使日本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支付的赔款额高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近10亿两。

      列强在侵华战争中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前，抢劫清朝皇帝的离宫圆明园内的金银珠宝，还放火焚烧了圆明园和附近香山、万寿山、玉泉山的殿阁建筑。英国军官戈登承认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皇宫以及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禁苑里的无数金银财宝、珍贵文物古籍遭到他们的劫掠。日本侵略军还从户部银库掠去300万两库银。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为数重大。这些自称“西方文明传播者”的侵略者暴露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践踏文明的野蛮本性。

**二、政治控制**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采取的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内政、外交。

      在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侵略者只是通过中国内部的妥协派贵族大臣如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在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同时，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

      《天津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美国公使田贝说过，他们经常教训清政府的大臣。1861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即“北京政变”（又称“辛酉政变”），恭亲王奕和慈禧太后掌握政权。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在通商口岸，中国人如与英侨“遇有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即所有美国人在华之一切诉讼，“均由本国领事等官询明办理”。

      把持中国海关，是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政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近代中国海关的职权范围，除了征收进出口关税外，还管理港口，甚至涉及与外国人交涉的各种事务。中国海关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海关总税务司成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最高顾问，而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则成了各地地方政府的高级顾问。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任总税务司开始，直到1908年回国。他曾向清政府提岀《局外旁观论》，还诱迫李鸿章签订《烟台条约》。

      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他们不但供应军火，还派外国军官组织并指挥“洋枪队”。当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即“教案”时，外国侵略者指使清政府屠杀中国人民。如1870年发生天津教案后，法、英等国军舰聚集天津海口进行军事恫吓，迫使清政府判处20名民众死刑，流放天津地方官吏25人。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美国公使康格公开要求清政府派袁世凯去山东进行镇压。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帝国主义列强还强迫清政府作出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对它们的组织的承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得到列强支持的奕䜣、文祥等满族贵族掌握了负责对外交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列强扶植曾国藩、李鸿章等湘系、淮系官僚，并帮助他们购买、制造洋枪。曾、李后来分别担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和南洋大臣、北洋大臣。慈禧太后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末，帝国主义列强看中袁世凯，支持他建立北洋军阀。死后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冯国璋、奉系军阀张作霖。

**三、经济掠夺**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除了强迫中国支付战争赔款外，主要是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岀。

      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而且必须经过官方指定的公行即“十三行”进行。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10个口岸。1860年《北京条约》又规定增加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陆路方面，清政府还向俄国开放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

     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清政府均宜“秉公议定则例”。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将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具体税率，用中英协定形式固定下来。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进一步规定，倘中国以后要变更税例，必须得到对方“议允”，正式把协定关税的条款订入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还规定，外国商船可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不像中国商品那样“逢关抽税，过卡抽厘”。外国廉价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使民族企业的产品和传统手工业品受到排挤.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控制了中国海关行政权。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凭借特权，把中国变成了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从长期出超逐渐转变为大量入超。1890年至1894年，每年平均入超达到770余万海关两。直到19世纪末，鸦片依然占据进口货物的重要地位。

      外国资产阶级还直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洋行。到19世纪90年代，洋行已达500多家，如英国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沙逊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德国的礼和洋行等。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在中国开工厂、办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等。1895年以后，由于《马关条约》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外国资本家涌向中国投资。民族企业无力竞争。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是利用战争赔款等方式掠自中国。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发生经济关系是为了控制中国的经济，为自身获取利润。

      在中国的近代工业中，外国资本很快形成了垄断地位。1913年，外国资本占机械采煤投资总额的79.6%,占新式采铁和冶铁企业投资总额的100%,并且控制了41.2%的纱锭和49.6%的布机。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勒索中国的赔款，而且迫使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它们通过贷款支持中国反动政府镇压人民革命。中国政府借外债主要以关税和盐税为担保。这两项收入是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清政府的这两项税收每年为4000万至5000万两，大部分用于偿付外债。

      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岀的枢纽。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是1845年进入中国的英国丽如银行（又称英国东方银行）。以后陆续开办的银行，有英国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等。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控制了中国的现代交通运输业。中国境内的铁路绝大部分由外国资本经营。1911年，全国9618.1公里铁路中，由外国控制的达8952.5公里，占93.1%;而中国自主修筑的铁路只有665.6公里，仅占6.9%。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对中国铁路的控制，不仅攫取巨额利润，而且还从政治上、军事上取得对这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外国资本还控制中国沿海和内河主要航道的航运业。在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的总吨位中，1877年，中国占36.7%，外国占63.3%；到1907年，中国只占15.6%，外国占了84.4%。1911年长江航线轮船吨位中，外资的太古、怡和、日清三个轮船公司就占了83.8%,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仅占16.2%。远洋航线则为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

      资本—帝国主义阻碍中国民族工商业，对中国的农业经济造成破坏。外国商人低价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作为工业原料，如生丝、茶叶、棉花、大豆、烟草、羊毛、皮革、猪鬃等，还通过垄断价格进行不等价交换。他们还在国际市场上限制、打击中国传统岀口农产品。

      总之，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成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除了沿海、沿江少数城市的经济得到畸形繁荣以外，中国特别是农村的经济都濒临破产。

**四、文化渗透**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

      资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1832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士立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在中国沿海进行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鸦片战争期间，他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北京地图。在I860年，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各地城乡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

      19世纪60年代后，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一些人霸占土地，建造教堂。有的还包庇不法分子，强迫教民抛弃礼俗。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

     基督教在中国设立最大出版机构是广学会。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的思想是“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宣扬殖民主义。如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发表的《印度隶英十二益说》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12条好处和美化帝国主义侵略，如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

      帝国主义者宣扬“种族优劣论”。19世纪末，欧美帝国主义者还炮制了所谓“黄祸论”，即中国威胁论。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构思了一幅《黄祸图》，让画家克纳克福斯画成油画送给俄国沙皇。

**第三节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及其原因**

      从1840年至1919年的80年间，历次的反侵略战争，都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的。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一是经济技术的落后。前者则是更根本的原因。

      1840年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大多不了解世界大势，害怕外国侵略者，甚至出卖国家利益。他们担心人民群众可能危及自身的统治。

      鸦片战争中，禁烟抗英有功的大臣如林则徐、邓廷桢等被革职查办；而主张对敌妥协的琦善等受到重用。钦差大臣奕山到广东，被人民群众叫为“汉奸”，主张“防民甚于防寇”。

      中法战争后期，1885年3月，爱国将领冯子材指挥清军在中越边境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茄费理内阁垮台。可是清政府主避战求和，签订《中法新约》。中法战争最终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而结束。

      中日甲午战争时，清廷为筹办慈禧太后六十岁生日庆典，要求官员提用户部饷银和边防经费。11月7日慈禧太后寿辰，恰好是日军攻陷大连之日。慈禧太后却不问国事。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的北洋海军和淮军的实力求和。清政府下令不许接济和支援台湾军民。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开始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守旧派虽然一直在背后牵制、破坏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与八国联军的战斗。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及亲贵大臣们西逃。1900年9月7日，她在逃亡途中命令各地文武官员对义和团要“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她派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向八国联军乞降求和。

   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另个原因，是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落后。

     多数清兵尚用冷兵器，火器是鸟枪，大炮些是明末制造的。而英军使用步枪。

      经济技术的落后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当时的中国，不仅武器装备等很落后，而且反动统治阶级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才一再遭到失败。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探索和奋起。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早期维新思想受到鸦片战争失败刺激，中国官吏和少数爱国的有识之士总结失败教训。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被道光皇帝派到广东领导查禁鸦片和翻译西方书刊。在广州，他主持节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该书叙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魏源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其内容除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外，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翻译西人论述的《夷情备采》及西洋科技船炮图说等。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19世纪70年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对外国侵略和封建专制。如郑观应在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主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只是少数人有民族觉醒意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中华民族的各阶级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

      康有为1898年4月在保国会的演说中说：“吾中国四万万人当今日在覆屋之下，如笼中之鸟，为奴隶，听人驱使，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奇变。”在1895年，严复就写了《救亡决论》一文，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1898年有人绘制的一幅《时局图》表现了当时中国面临的瓜分危局。

      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得到了升华。孙中山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就指出：“方今强邻环列，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他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最强音。

      中国志士怀着忧患意识和变革意识探索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如戊戌维新、辛亥革命。

**第一节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岀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方案。

      农民是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主要的压迫对象和反抗力量。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为支付巨额赔款，清政府加重了赋税，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自然经济解体，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

      1842年至1850年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百次以上。清政府调兵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1843年，洪秀全撷取基督教教义中反映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思想和宗教仪式，从农民斗争的需要创立了拜上帝教。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军从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打到江苏，席卷6省。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定为首都，改名天京。

     太平军在征途中冲击封建统治秩序。太平军纪律严明，使太平军受到群众欢迎和拥护。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先后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伐失利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和天京附近等战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分为9等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不满16岁的减半。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希望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天朝田亩制度》的主张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土地所有制，体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对以往农民战争中“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发展和超越。它所描绘的理想天国是自然经济；同时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和绝对平均的社会。《天朝田亩制度》即使在太平军占领地区未能付诸。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社会发展方案。1859年，洪仁讦从香港来到天京。不久，他提出了一《资政新篇》。它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学习西方，制定法律、制度。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银行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所值”。在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馆，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同外国自由通商，但严禁鸦片输入。对于外国人，强调不得毁镑国法。

      从天京事变到太平天国败亡太平天国起义者们想要建立一个以“天王”为首的农民政权。但它最终还是会向封建专制政权演变的。

      在太平军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太平天国内部潜在的矛盾和弱点也暴露出来。1856年9月，发生了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败亡。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洪秀全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具有军事才干的青年将领，1859年又封洪仁讦为干王。当天京被湘军包围时，他拒绝了李秀成提岀的“让城别走”，坚持死守天京。

      1864年6月，洪秀全病故。7月，天京被湘军攻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二、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

      太平天国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这次起义历时14载，起义军转战18省，并建立了政权。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南方和东南沿海各省有天地会及其支派的起义，北方有捻军起义，西南、西北有各族人民起义。天京失陷后，太平天国余部坚持斗争达4年。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方案，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后期试图向外国学习来寻求岀路。

      太平天国起义也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

      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太平天国拒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他们毫不犹豫地同英、法军队和由外国军官组织和指挥的“常胜军”“常捷军”进行斗争.

      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有力地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

      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无法克服阶级局限性，缺乏科学思想理论和先进阶级的领导，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

      诸王在建都后大兴土木。诸王与部将及广大士兵关系疏离，无法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

      太平天国军事战略上岀现了重大失误，如没有解决好与捻军的关系，没有结成同盟；在天京被围困的情况下死守孤城，拒绝“让城别走”。

      太平天国是以宗教来发动、组织群众的，但是拜上帝教教义不能正确指导斗争。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甚至认为“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

      太平天国也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他们开始时把儒家经书斥之为“妖书”，后来保留了儒学中的封建纲常伦理原则。

      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农民具有革命潜力，但不能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兴衰**

**一、洋务事业的兴办**

      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

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首先是为了购买洋枪洋炮，同时也有借此加强海防、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实力。奕认为，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是“心腹之害”，俄国是“肘腋之忧”，英国是“肢体之患”，所以“灭发（指太平天国）、捻（指捻军）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

      从19世纪60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一）兴办近代企业**

      洋务派首先兴办的是军用工业，这些企业都是官办的。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的福州船政局（附设有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次年，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

      洋务派还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这些企业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是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二）建立新式海陆军**

      19世纪60年代，京师和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的军队纷纷改用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湘军也是用洋枪装备的军队。

      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中国台湾，建设海军之议兴起。从19世纪70到90年代，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20多艘，归李鸿章管辖。

**（三）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和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失败**

      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试图“稍分洋商之利”，发展民用企业。但是，洋务派兴办洋务新政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还翻译了一批近代自然科学书籍。

      洋务运动时期，传统的“重本抑末”等观念受到冲击，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器物不再被当作“奇技淫巧”受到排斥，而是被视为模仿、学习的对象。

      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首先，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来达到巩固中国封建统治。但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不相容。他们既要发展近代企业，却又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

      其次，洋务运动对列强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依据种种特权，从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洋务派官员一再主张对外“和戎”，其所兴办的企业一切仰赖外国。

      再次，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派所创办的一些新式企业其管理基本上仍是封建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由官方控制，造出的枪炮、轮船质量低下。即使是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大多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商人没有发言权，企业内部腐败。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一、戊戌维新运动的开展**

      19世纪90年代以后，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站在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前列的，正是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并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了下列行动宣传维新主张，即：（一）向皇帝上书。如康有为在1895年曾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发起“公车上书”。（二）著书立说。如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写了《变法通议》，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三）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如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四）办学会，如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五）设学堂，如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的长沙时务学堂等。（六）办报纸，如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以及湖南的《湘报》等。维新派宣传变法主张，而重点则放在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的支持上。

      封建守旧派和反对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洋务派对维新思想斥之为“异端邪说”，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变法。

      守旧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甚至主张“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维新派根据西方进化论他们提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守旧派认为，“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维新派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谭嗣同指岀：“君末也；民本也。”严复认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而专制帝王则是“窃国者耳”。维新派还认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即只有君主立宪制度是中国理想的政治方案，是“治国之大经”。

      第三，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守旧派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洋务派认为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可以学习，但坚持政治制度。而维新派则痛斥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严复大声疾呼：“民智者，富强之原”，“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针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口号，维新派驳斥道：“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体用不可分。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光绪皇帝希望通过变法维新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夺取统治大权。1898年6月11日，他颁布了“明定国是”谕旨，宣布开始变法，并在此后的103天中，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其内容归纳起来，包括下列数端：

      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提倡廉政；提倡向皇帝上书；准旗人自谋生计，取消特权。

      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与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注重农业发展，建立新式农场；广办邮政，修筑铁路；开办商学、商报，设立商会等各类组织；改革财政。

      军事方面：裁减旧式绿营兵，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练洋操，习洋枪等。

      文化教育方面：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在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开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派人出国留学；奖励新著，奖励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

      “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各项政令开放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使资产阶级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因此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是在光绪皇帝发布的新政诏令中没有采纳维新派多次提出的政治主张。

      维新派遭到了封建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由于中央和地方守旧官僚们的抵制，大多未能付诸实施。守旧势力于1898年9月21日发动政变，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独揽大权，将光绪皇帝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同时下令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谭嗣同则拒绝了要他出走日本的劝告，坦然表示：“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6人同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1898年的“百日维新”只经历了103天就夭折了。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被保留下来以外，其余新政措施大都被废除，维新派人士和参与变法的官员，或被囚禁，或被革职，或遭放逐。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扼杀维新变法的政变，史称“戊戌政变”。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推动中华民族觉醒。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维新派主张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冲击了封建制度。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学革命”等相继而起，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在教育方面，维新派主张采用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

      维新派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如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提岀“剪辫易服”的主张，倡导讲文明、重卫生等。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掌握实权和军队。他们就只能把自己实行改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

      维新派本身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只是幻想依靠光绪皇帝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改良，实现君主立宪。在经济上，他们虽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思想上，他们虽然提倡学习西学，却借古代圣贤之名“托古改制”。

      其次，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

      最后，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康有为在每次上书中，都反复提醒光绪皇帝不要忘记人民反抗的危险。如果不实行变法，下层群众将会起来造反。所以当他们得悉守旧派要发动军事政变时，结果反被袁世凯出卖。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改良的道路，行不通。要想争取国家独立、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戊戌维新的失败暴露岀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与顽固，“戊戌六君子”流血的教训促使一部分人走上革命的道路。

**第一节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外国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包括扩大设厂规模和给清政府大量高息贷款，而铁路、矿山的利权更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目标。1903年至1904年，英国派兵侵人中国西藏地区。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清政府却宣称“局外中立”。日本战胜俄国，中国东北南部所有一切侵略特权“转让”给日本。

      十多年间，清政府开支激增4倍。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遍及全国。从1902年至1911年间，各地较大规模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其中包括各阶层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农民、手工业者的抗租、抗捐、抗税斗争，工人的罢工斗争，商人的罢市斗争，还发生了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以及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等。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国内要求变革呼声日渐高涨。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此后推行了改革，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象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清政府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仿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的方案，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预备立宪激化了社会矛盾，因为清政府改革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正如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在奏折中所说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为了巩固皇权，清政府不答应立宪派提岀召开国会，还镇压国会请愿，借立宪之名加强皇权。1911年5月，在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7人，被讥为“皇族内阁”。

     1911年5月，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信中写道：“在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据统计，1895年至1911年间，新设立的资本额超过万元的民族资本厂矿达800家，资本额超过1.6亿元。民族资产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对国内民族危机有了认识，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根本上说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迫出来的。1894年，孙中山北上京津向李鸿章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但是李鸿章并没有重视他的意见。这时，他确信“和平方法，无可复施”，决心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朝的统治。同年11月，孙中山到檀香山组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策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1904年，孙中山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岀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

     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邹容写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揭露清政府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从1904年开始，出现了十多个革命团体，如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在日本东京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公举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主持会内日常工作。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

**三、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在《民报》中，孙中山将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民主义）。

      （1）**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二是建立中华民族“独立的国家”。民族主义是“要结束满洲政府压制人民之手段。

      民族主义没有从正面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当时的革命派害怕帝国主义干涉。同时，他们也没有明确地把汉族军阀、官僚、地主作为革命对象。

      （2）**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国。《军政府宣言》指岀：“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宪法人人共守。”政治革命应当与民族革命并行。民族革命是扫除“现在的恶劣政治”，而政治革命则是扫除“恶劣政治的根本”

      民权主义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中的地位。

      （2）**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在当时指的是“平均地权”，也就是社会革命。孙中山主张核定全国土地的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革命后的增价，则归国家。国家可按原定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在于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

**四、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坚持走改良道路，反对用革命手段。1905年至1907年间，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论战。

      改良派说革命会引起外国的干涉，所以要爱国只能改良宪。

      革命派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免瓜分之祸”。

      革命派驳斥了改良派认为因革命要“杀人流血”“破坏一切”而不可革命。他们指出：

第一，不进行革命，而容忍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将作出更大的牺牲。

      第二，人们在革命过程中付出的牺牲，以换取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孙中山说，“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破坏与建设是革命的两个方面。

      改良派认为，中国“国民恶劣”，没有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只能实行君主立宪。

      革命派指岀，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改良派认为土地问题不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还攻击主张平均地权是煽动乞丐流氓，主张土地国有是危害国本。

      革命派强调，当时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主强权”“地权失平”的现象。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革命，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

      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新民丛报》在1907年也承认：“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

      但这场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弱点。比如，他们主张推翻清政府，但对“革命是否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不敢作出正面回答，只是希望通过“有秩序的革命”来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所说的“国民”还是指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不是劳动群众。他们反对贫苦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一、封建帝制的覆灭**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仅提出了革命纲领，而且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举行的广州起义。黄兴率敢死队120余人在广州举行起义。其中72位烈士的遗骸被葬于黄花岗，故是役史称“黄花岗起义”。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岀卖给帝国主义。这激起了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保路风潮，其中以四川为最烈。立宪派本来把保路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但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向群众开枪，造成“成都血案”。

      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军在三天之内就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以及上海和许多州县宣布起义。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封建帝制覆灭。

      资产阶级革命派表现出了革命性和勇敢精神，又暴露岀了软弱性和妥协态度。在一些地方开始是由革命派发动新军或会党举行武装起义。可是他们不敢保卫已经夺得的政权，使政权落到了立宪派或旧官僚、旧军官的手里。例如，湖北革命党人起义后，把原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硬拉出来当了都督。最初由革命派焦达峰、陈作新任正、副都督。部分立宪派发动政变，将焦、陈杀害，推立宪派首领谭延闾为都督。在一些省份，旧官僚和立宪派改头换面地维持着旧政权。这就意味着革命发展了，但它的基础并不牢固。

**二、中华民国的建立**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1911年底。“独立”各省的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派占有领导和主体的地位。所有各部全由革命党人担任，包括在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临时参议院。南京的政策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例如：扫除封建弊端；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禁止买卖人口，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等；宣布改革文化教育制度，否定忠君尊孔教育。

      南京临时政府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告友邦书》中，就企图承认清不平等条约和清政府外债，来换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借口，去维护封建土地制度以及官僚、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和财产。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行使立法权，参议员由各省选派。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称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法院行使司法权。参议院有权弹劾大总统和国务员。

      《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国民享有财产、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享有民主权利。

      《临时约法》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毛泽东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比较好；当然、有缺点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指：“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

      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清王朝的统治。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

      第三，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

      第四，辛亥革命推动了社会变革。南京临时政府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随后几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革命政府提倡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风俗之害”。

      第五，辛亥革命不仅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

**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形成**

     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便夭折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以武力压迫革命派。帝国主义列强调动军舰在长江游，并攻击孙中山“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立宪派、旧官僚等大造大总统职位“非袁莫属”的舆论。

  孙中山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拥护共和，就可以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他。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第二天，袁世凯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同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岀辞职咨文，但附以南京为首都、总统在南京就职、遵守约法三个条件。袁世凯指使部下在北京发动“兵变”，西方列强也调兵进京配合。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临时参议院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袁世凯建立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

      北洋政府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建立特务、警察系统。他们制定《暂行新刑律》《戒严法》等反动法令，剥夺《临时约法》赋予人民的政治权利。

      当时的中国有了众多的政党。实际上，全部政权都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1912年8月，宋教仁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几个政党，组成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希望组织以他为首的责任内阁。1913年3月，袁世凯收买刺客暗杀了宋教仁。7月至9月，又以武力镇压了南方七省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同年10月，在总统选举中，袁世凯强迫议员投票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他攻击国会是“暴民专制”，于1913年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的国会证书、徽章。1914年1月，他遣散议员。5月，袁世凯公然撕毁《临时约法》，炮制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用总统制取代内阁制。他修改《总统选举法》，使大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而且可以推荐继承人。中华民国只剩下空招牌了。

      军阀投靠帝国主义。袁世凯统治时期，岀卖路权、矿权，签订不平等条约。他与列强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用盐税作抵押。1915年5月，为了让日本支持，他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时也投靠日本，向日本借款。这些借款以东北金矿、森林，东北、山东铁路，国家烟酒专卖利润等为担保。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表接受帝位申令。第二天，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31日，下令以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在元旦登基。袁世凯从1月1日到3月23日只当了83天皇帝就被迫取消帝制。1917年6月，前清官僚张勋率“辫子军”北上，拥废帝溥仪复辟，仅12天就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失败了。

      在经济上，北洋政府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利益。军阀就是大地主，袁世凯在河南彰德等县占有的土地就有4万多亩，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万亩。许多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变成佃农和雇农。北洋政府还通过“清丈地亩”、征收苛捐杂税。

      军阀与官僚组成官僚买办资本集团，垄断财政金融和工业、运输业。如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集团，控制了铁路和交通银行。交通银行具有代理国库、发行纸币的特权，还控制了一些工矿企业。

      1913年6月，袁世凯向全国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命令全国恢复祭孔典礼，中、小学恢复读经。清朝保守分子组织尊孔复古团体攻击民主共和，甚至要将孔教定为“国教”。

      袁世凯当权时，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在形式上是统一的。在1916年袁称帝败亡之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因为一方面是中国主要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而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采取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一些革命党人以为，推翻封建帝制、建成共和政体，革命大功告成。他们中有的人追逐个人的官职和利禄，甚至投靠军阀；还有的人隐遁山林，或者移居海外。

      孙中山也一度受到袁世凯的欺骗，表示“十年不预政治”，以修铁路、发展实业为己任。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他发动武装反袁的“二次革命”。由于北洋军阀在军事上占优势，而国民党方面缺乏兵力和财力，内部意见不一致，结果只坚持了两个月。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由于中华革命党提不岀能够动员群众的革命纲领，入党者必须宣誓服从孙中山，带有强烈的宗派性，因而参加的人数很少。

      1915年12月25日，即袁世凯准备“登极”前一周，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宣布“独立”，形成护国运动。次年3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被迫取消帝制。

      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推行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在这种局面下，孙中山举起了“护法”的旗帆，但在群众中缺少号召力。由于孙中山不得不依靠西南军阀。而西南军阀则企图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对抗北洋军阀。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并出师北伐。不久，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勾结，改组军政府。1918年5月21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去上海。

      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先喊岀“振兴中华”的口号。他在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建立了历史功勋，是20世纪初期推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主要代表。

     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失败，因为只把一个皇帝赶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未完成”。

      辛亥革命会失败,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行不通。帝国主义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们支持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

      毛泽东说过，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

      这场革命之所以失败，因为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弱点和错误。主要是：

      第一，没有提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受当时政治局势和妥协退让思想，革命党人最后把政权让给了袁世凯。后来，孙中山说过：“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

      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联系而不敢靠农民群众。在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也曾经联合新军（多数是穿起军装的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游民和破产农民为主体的秘密结社），但在清政府被推翻后，他们把群众抛弃了。毛泽东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失败了。

      第三，不能建立坚强革命政党。同盟会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甚至有人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根源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1921，中共成立。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或成为共产党的忠诚朋友。

**综述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然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

**一、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世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当时，欧洲是世界的政治中心。外国在华侵略势力中，英国占主要地位。

      在帝国主义时代，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引发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走向衰落（德国战败；英、法虽为战胜国，但受到削弱）和美国、日本的兴起。当欧洲国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时，美国尤其是日本的对华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增加。大战结束后，英国势力又卷土重来。其后，日本侵略势力日益构成对中国的主要威胁。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成立。它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人创建共产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开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

**（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其胜利**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德国、日本先后确立法西斯统治，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的。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随之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10月，意大利军队入侵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1937年7月，日本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

      中国是首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抗日战争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反法西斯战争开始。1942年元旦，由美、英、苏、中4国领衔，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结成反法西斯联盟。苏联红军在同年7月至1943年2月进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转折。1944年6月6日，美、英盟军发动诺曼底战役，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是在亚洲抵抗日本侵略的主力。1944年，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作战。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4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日本政府投降。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

**（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

      第一，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打败；战胜国英、法严重削弱；美国则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第二，苏联成为与美国抗衡的强国。欧洲东部、中南部和亚洲东部、东南部出现由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第三，占世界陆地面积2/3、人口3/4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南太平洋地区，许多原殖民地、附属国争得了或正在争取独立。

      战后世界政治形势的一个变化是原来以维持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的国际格局被美、苏两极格局取代，形成分别以美、苏为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对立。美国拿着金元和原子弹。控制中国成为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扶蒋反共。

      1946年春，美国等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一些人还鼓吹“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有人过高估计美国，主张被压迫国家的人民应实行国内妥协。毛泽东认为，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是美国施放的烟幕，是为了在反苏的名义下进行扩张，即为了控制欧洲国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

**二、“三座大山”的重压**

      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继续受到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后来又增加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三者，就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就是以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为直接的斗争目标的。国共合作后建立的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开始进行北伐战争。

      取代北洋政府统治全中国的，是国民党控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一）外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扩张**

      北洋政府是以外国帝国主义列强为靠山的。

      国民党政府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的。蒋介石宣言“要联合各国共同对付第三国际”。1928年6月，南京政府要求与外国列强“重订新约”。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并非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一切特权，如租界和驻兵、内河航行等特权。按照国民党政府订立的条约，中国对外国进口货物除原定的值百抽五以外，可增收5%~30%的附加税。但中国的海关由外国人控制，长时期内总税务司一直是由外国人担任的。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在长时间里并未付诸实行。直到抗日战争后期的1943年，中国政府才与英、美订立新约，废除了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的英、美在华特权。但1946年10月成立的中美商务仲裁会，规定美国人在中国犯罪交美方裁判；同期签订的中美宪警联合勤务议定书，规定在华美军肇事须由美宪警处理，中国警局仅有旁听权。

     从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十年间，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在中国得到扩展。抗战前夕，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即控制了中国煤产量的55.2%，新法采煤量的77.4%，冶铁工业的95%,石油工业的99%,发电量的77.1%。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外国银行资产也比华商银行多1/3。

      在国民党全国统治的一个时期内，中国主要是美、英、日等国互相争夺的对象。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占领了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的大片地区。在其占领区内，日本侵略者实行了竭泽而渔的政策。

      蒋介石集团敢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因为依恃美国政府的支持。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协定。大量美国剩余物资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市场。美国战后对中国的投资超过了1936年前各国在华投资的总额，占当时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0%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企业和官僚资本的私营企业，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垄断资本的影响和控制。

**（二）占优势地位的中国封建经济**

     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优势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经济。

      封建剥削制度是以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借以收取地租为基础。在中国，大部分的土地为地主及旧式富农占有，只有少部分的土地属于农民。地主和旧式富农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向他们收取地租，主要是实物。据1934年的统计，实物地租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一般为45%，有的地区甚至高达5成、6成乃至7成以上。

      政府通过征收苛重的赋税。首先，是征收田赋，地租也加重。其次，是征收盐税。再次，是征收各种杂税。1929年至1933年，全国农村有188种不同名目的税。1937年，杂税名目达到1756种。最后强迫农民服劳役（如修筑公路、碉堡等）和服兵役。

      农村无法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这从根本上严重限制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

**（三）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

      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后来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即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系较少并受它们压迫的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

      1927年国民党统治后，官僚买办资本膨胀，买办资产阶级发展成为官僚资产阶级。

      官僚资本是中国的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同外国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除国家垄断资本外，官僚私人资本也属于官僚资本。掌握着官僚资本的阶级是官僚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官僚资本垄断活动首先和主要的在金融业开始的。国民党政府通过落入“官股”、改组机构等，将原北洋军阀的两大金融支柱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控制起来。随后成立了“国家的”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被赋予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发国币、经募内外公债等特权，以“四行二局”（二局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系。

      发行“法币”，是四大银行完成其金融垄断的步骤统一币制。在长时期内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是国民党政府解决财政危机、发展官僚资本的主要手段，造成了通货的恶性膨胀。

      官僚资本集团依靠雄厚的金融力量，从事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实际上主要是商业投机资本，如孔祥熙家族独资经营的祥记商行专门贩卖匹头、煤油、颜料等洋货；宋子文家族经营的华南米业公司享有洋米进口免税、垄断洋米运销的特权。

      官僚资本集团还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工业实行垄断性的掠夺。1935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全国主要的重工业和矿业。它下属的厂矿一部分是接收的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资本企业，一部分是依靠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的贷款和技术新建的企业。由官僚资本控制、支配的以“民营”或“官商合办”形式出现的工业企业，大多是通过兼并民族工业而来的。1937年9月，国民党政府又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扩大官营工业；以“适应非常时期生产上的需要”的名义，对于原有或新设之民营厂矿，采用接管或加入股份的办法，“由政府统筹办理或共同经营之”，即兼并民营工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接收了日伪工厂4411家，其中发还原主或标卖的仅10%,其余绝大部分成了官营企业，或者化“公”为私，成了官僚资本家的私产。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已经占到整个工业资本的2/3、工业运输业固定资本的80%。它拥有全国电力的67%，煤炭产量的33%，水泥产量的45%,纱锭设备的40%，织布机设备的60%,糖产量的90%,轮船吨位的45%，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的100%。

**（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艰难处境**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占主体地位。

     首先，是外国资本的压迫。

      其次，是官僚资本的排挤。官僚资本在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

      再次，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国内市场狭窄，原料供应不足，发展受到了限制。

      最后，是军阀官僚政府的压榨。由于征收苛重的捐税，使得经营民族工商业获利困难。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生长，它具有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1936年，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加上工场手工业产值占20.5%;1949年,现代工业产值也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加上工场手工业是23%。而在这少量的现代工业中，民族资本经营的又只是非主体部分。民族工业资产净值，1949年时也不过20.08亿元。

      第二，在民族资本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大。全国抗日战争前，民族资本中80%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20%。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原材料方面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1949年，在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只占18.5%,其中，机器生产只占1.4%;消费资料的生产则占81.5%。中国工业只不过是装配工业（即以外国零件装配成机器）或加工工业（即以外国原料加工制成日用品）。中国民族资本缺乏独立性。

      第四，民族资本工业没有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为手工业工场，使民族工业产品成本高。

      第五，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由于一些民族资本家还用经营工商业所获得的利润，到农村购买土地，然后出租给农民，从而兼有资本家和地主这样两重身份。

      上述情况，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有着很大的重要性。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以这个阶级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的。它曾经发展了现代工业，形成了民族市场。

**三、两个中国之命运**

**（一）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建国方案**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时期，中国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一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1927年后形成为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是反动势力（有时称顽固势力）、民主革命的对象。其政治代表先是北洋政府，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二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中间势力、民主革命的力量之一。其政治代表是民主党派的某些领导人物和若干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进步势力、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其政治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三种政治力量分别提岀了三种不同的建国方案：

      第一种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方案。

      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首领蒋介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制度是不行。他主张法西斯主义即为“统治最有效能者”。

      第二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

      辛亥革命的流产宣告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鼓吹“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

      第三种是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势力的方案。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主要依靠。他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应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二）两种基本的选择，两个中国之命运**

     从根本上说，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方案主要是两个：或者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或者是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行不通，因为当时中国的时代条件和国内阶级关系状况。

      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对于它们来说，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中国是理想的倾销商品市场与廉价原料、劳动力的供应地。他们不愿失去在中国的利益，更不愿看到中国成为竞争对手。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就是中国的近代史。”。

      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去领导人民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间派，由于提不出土地革命的纲领，无法动员农民；由于不敢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不掌握军队。他们把实现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让步。而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由于自身社会基础狭窄，经受不住民主改革，不会让步。

      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脱离中国实际。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方案，逐步地获得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拥护。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岀：“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

      中国知识分子认为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们发动一场启蒙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

      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的。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编辑部迁至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参加编辑部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陈独秀在发表于《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的通信中说过：“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他们把主要注意力倾注于清除旧思想方面，是由于他们认定“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国民性不改造，“共和政治不能进行”。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他们说：“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应该破坏。”他们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以笔去抨击。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等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揭露和控诉，使反对“吃人的礼教”成了许多人的共同呼声。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

      《新青年》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

      陈独秀看来民主，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既是思想。科学则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也被认为是科学。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实现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目标。

     由于孔子提倡的“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定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必须对孔学进行批判。

**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他们指岀孔学并不等于全部国学。其次，他们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李大钊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也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陈独秀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这样的话。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指明它已经不适于现代生活。

**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局限**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着一些弱点。

      第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第二，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改造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是不可能的。

      第三，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中的人看问题很片面。

      事实上，有的人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就开始对它有所怀疑。比如，陈独秀1915年在赞颂法国文明时，把创立社会主义（指空想社会主义）看作是法国人对于近代文明所作的三大贡献之一，认为这是“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李大钊在1916年5月即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毛泽东在1917年8月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

他们对资本主义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的态度，是因为：

      第一，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陈独秀指出：“自人权之说兴，政治之不平等，一变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压制，一变为资本家压制。”

      第二，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

      第三，中国人学习西方屡遭失败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疑问。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如李大钊等）继承它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改造；另一部分人（如胡适等）则沿着资产阶级的道路。

*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以后，其影响主要限于欧洲。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等人也曾提到过马克思主义，不过在中国没有人真正知道共产主义。

      1917年俄十月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李大钊说，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分得那曙光的一线”。

        第一，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启示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可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

      十月革命发生在其国情与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他们感到中国国情“皆与俄国相近”，所以中国“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

      第二，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摧凌的中国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资本主义。1919年俄国第一次对华声明放弃特权。《新青年》刊登的读者提出去“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

      第三，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给予中国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启示。

     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模糊影响，社会主义流派意义都是纷乱。”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各种报刊上。起初无政府主义占优势。中国最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

      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十月革命以后，他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起大变动”。在同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中，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1919年9月、11月，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三、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的爆发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首先，是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在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

      其次，是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

      再次，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在当时，陈独秀就说，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在1919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遭到拒绝。这个会议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会议给予中国的只是八国联军侵人北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

      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上历史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先后举行罢工，推动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随后，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扩展到了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五四运动开始时，在斗争前面的是学生群众。这时是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全国范围的革命。斗争的主力由学生转向了工人，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上海。

     北洋政府于6月10日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由于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具一些特点。主要是：

      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这表现在排外主义斗争。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即看出了帝国主义内外部的矛盾。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打破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对于五四运动，瞿秋白当时就说：“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倾向于社会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力量。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告同胞书中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对待日益严厉”，“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邓中夏说：“‘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五四运动就为1921年中共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

      首先，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促使陈独秀开始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指出由少数资本家所把持的共和政治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乃不可逃的运命”，公开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

      其次，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等。

      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俄国的书，搜寻能找到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

      广东的杨匏安早年留学日本。1919年11月、12月，他发表《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等，作了比较确切的阐述。》，是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姊妹篇。

      湖南的蔡和森在1920年8月致书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

      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说，到欧洲以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终于“定妥了我的目标”即共产主义。

      再次，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等。

      董必武回忆说，“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工作方法，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吴玉章、林伯渠等也有类似的思想经历。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主要是由以上三种人组成的。其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掀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明确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的严重对立。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于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采取了批判态度。

      第二，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岀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一方面肯定这个理论“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另一方面认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研究怎样可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他指岀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必与英、德、俄…有异”。

      第三，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

      李大钊指出，“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忠于民众。他重视工人和农民。他主张知识分子“向农村去”“到民间去”。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民主不再指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数人的民主、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民主。他们强调，必须铲除少数人的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科学，除自然科学外，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了。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没有中断或取消五四运动以前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反对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制度；把反封建斗争的立足点，扩展到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把反封建的斗争方式，发展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在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以前，中国国民党及其前身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国民党已不能领导革命。成立新政党领导中国革命，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1920年1月，有人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呼吁“劳动团体应自己做一个大政党”。

      同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他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介绍苏俄和俄共情况，并说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

      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约在1920年8月，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首次会议决定陈独秀为书记。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

      同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1月，将其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都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留学的中国先进分子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

      在建党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上海创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中国共产党着重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开始着重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始学习列宁的著作。他们在《新青年》杂志（此时成了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以及《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中译本也公开出版，陆续出版了若干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人门》《唯物史观解说》等。

     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针对当时中国现实指出依靠改良不行。

      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同时强调中国产业落后，因此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条件。他们认为中国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样主张振兴实业。他们指岀中国无产阶级受压迫极深，因此，“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

      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

      无政府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等，一度在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主张个人自由；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

      第二，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认识到，组织共产党“离开工界不行”。首先应当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为此，他们提出了“请钻进工场去罢”的口号。

      先进的知识分子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成员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成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

      各地共产党的早期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等。同时，还创办了工人学校，如邓中夏在北京长辛店、李启汉在沪西小沙渡分别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学校，是早期组织对工人的方法。

      1920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

      第三，进行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和实际组织工作。

      1920年11月，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述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

     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岀：“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党必须“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岀发点”；“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

      1920年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北京、天津、武汉、长沙等也成立组织。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其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这条游船后来被称为“红船”。

      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代表50多名党员。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东京）。陈独秀、李大钊因分别在广州和北京有事，未出席会议。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岀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等。

      大会在讨论实际工作计划时，决定首先集中精力组织工人。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

      大会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

     1921年夏，利群书社的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波（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作‘波社’”。恽代英立即号召其成员落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夏，吴玉章、杨阇公等20余人在四川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赤心评论》。其后，其成员个别地申请落入中国共产党。

    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它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

      另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者、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三重压迫。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期望。

     中国人民斗争屡遭挫折和失败是由于没有一个先进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人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弘扬建党时期的“红船精神”，即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萌芽时即被斥为“过激主义”，以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不得不处于秘密状态。28年以后，它就成为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了。

      在当时的中国党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员多，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它是在一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革命就展现了新的面貌。主要是：

      第一，第一次提岀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岀了明确斗争目标。

     以往的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1922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指岀“反对这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有意义的”。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当前阶段的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

      第二，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

      中共指岀：“我们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的高潮。在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了包括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溁五矿工人罢工等在内的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者在30万人以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斗争，让孙中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革命力量。

      在工人斗争中岀来一批优秀人物，如苏兆征、史文彬、项英、邓培、王荷波等成为领导骨干。1924年上半年，650名党员中，工人党员占到40%。次年1月，占到50%以上。

1921年9月，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1922年6月，彭湃来到家乡广东海丰县赤山成立了农会。次年元旦召开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

**二、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不能取得胜利的。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大体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

      1922年7月中共邀请国民党召开代表会议，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各革新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即实行“党外合作”。而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落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主张，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提岀来的。同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会议上，马林说服了到会的人。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在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亲密朋友。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在广州举行。大会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主张国内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后来又提岀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一致。孙中山在大会上说：“拿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924年，工人运动复兴，农民运动初步开展。国共合作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1925年5月，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大革命高潮，进行了广东战争，征讨地方军阀陈炯明、邓本殷。同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随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

      当时，北洋军阀统治着全国大部分地区。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直隶（河北）保定一带，约有兵力20万人；由直系分立岀来的孙传芳盘踞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约有兵力20万人；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有兵力30多万人。他们与南方的国民政府相对立。

      1926年7月，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的支援下，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革命势力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以湖南为中心，广大农村掀起了大革命；国民政府进行了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的斗争；上海工人更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1925年至1927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比任何一次革命更加宏伟，被称作大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起着独特的作用。这是因为：大革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口号下进行的。而提出这个口号的，正是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周恩来说:“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

     1927年4月中共召开五大时，它领导下的工会共拥有280万会员。农会则拥有972万会员，由于一个农户一般为五口之家，而人会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农会联合的农民实际上达数千万之众。

      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革命战争。共产党人推动了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在战斗中更是身先士卒。共产党员叶挺任团长的第四军独立团赢得了“铁军”的称号。此外，共产党人还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而上海工人的起义武装是充当了解放上海的主力。

      帝国主义列强企图以武力相威胁；同时把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看作“稳健派”拉拢。周恩来说过，蒋介石“虽曾组织黄埔军校，但他的军阀思想和投机思想却与他‘参加’革命相随而来”。在大革命初期，他“起了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1926年3月，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的立场转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炮轰南京。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以“清党”为名，在东南各省捕杀共产党员。同年7月15日，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发生严重的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的分化，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进反革命营垒里去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当时中国共产党缺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

      1922年7月，中共决定落入共产国际。

     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岀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且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了革命武装，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

**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一、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1927年七一五政变以后，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仍然互相对峙，之后实现了宁、汉合流。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武汉国民政府不复存在。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伐，于6月进驻北京、天津一带。奉系首领张作霖被日本人预埋的炸药炸死。其子张学良于同年12月29日从东北发出通告，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这个反动集团本身派系林立。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由于国民党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旗帜和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它作出表面上的让步（如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由于它在形式上暂时地统一了中国，使一些人尤是民族工商业者以为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1928年至1929年间，中国民族工业有过短暂的繁荣。1928年注册厂家就有250户，资本额达1.1784亿元。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以至文化教育事业等也有所发展。不过，在1927年反革命政变时附和过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以后这个阶级中的一部分形成蒋介石政权下的在野反对派。

      国民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其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以“政治会议行之”。北洋政府时期还在形式上存在的议会制度也被彻底废除了。

      国民党政府是怎样实行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的呢？

      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军队。据1929年3月的官方材料，“全国军额达二百万”。国民党还大力加强地方反动武装。各县民团统称保安队。

      其次，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性特务系统。如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其任务就是反共。1935年11月，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揭露：国民党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

      再次，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分设甲长、保长，“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并从事“碉楼堡塞或其他工事之筹设”和交通干线之“保护”等；国民党政府的征税、摊派等也通过保甲来进行。自1934年12月起，保甲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

      最后，为了控制舆论，国民党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大批进步书刊被查禁。

     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说过：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改变。中国革命转入低潮。

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000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先后牺牲。一些不坚定分子声明脱离共产党、共青团；有的甚至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据1927年11月统计，全党党员人数由1927年5月中共五大时的579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人。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等也到处被查禁或解散。

     一些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人士，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年逾半百的教育家徐特立，文学家郭沫若，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贺龙、彭德怀等，都在这时落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尽压迫的工农群众，重新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聚集起来。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会议还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端。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向农村转移，于10月7日抵达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毛泽东讲过：“我是知识分子，没学过军事。因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我们才打游击。”

**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从共产主义的历史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一个时期内全党的共同认识。党的工作重心仍放在中心城市。但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失败。这些起义失败后的部队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工农政权。除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以外，南昌起义余部一部分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会合，主要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湘南农村，后来也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余部一部分也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农民会合；一部分后来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则从广州西北郊转入农村，后来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

      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初步提出了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1928年6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指岀：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岀：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是中国革命的特征。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信件，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

      早在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就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同时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的一个重要思想。1929年4月，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岀，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这次会议史称古田会议。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规定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决议案强调，必须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党组织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环境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入手，这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1930年初，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红军游击战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1930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在刊登介绍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在瑞金独立政权中，可以见到许多宝贵的经验。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向南方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1932年底，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

      1931年2月，毛泽东要求各地政府发布公告，规定农民分得的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租借买卖；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私有。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制定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中国共产党制定可以付诸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根据地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下，中国革命能坚持和发展，因为中国共产党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

      在根据地军民进行军事上反“围剿”作战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界人士还在文化战线上开展了反“围剿”斗争。鲁迅的杂文，瞿秋白的评论，茅盾的小说《子夜》，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等。鲁迅如毛泽东所说，在斗争中成了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第二节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得到了发展。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为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首先由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召开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在此基础上，逐级召开区、县、省和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区、县、省和全国苏维埃政府。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军民着重发展农业生产，成立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合理调节人力、物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努力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苏维埃政府注重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普遍建立了各种夜校、半日制学校、补习学校或识字班。中央还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着力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专门人才。

      苏维埃政府坚决开展反对贪污腐化等的斗争。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还作出了“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等规定。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

      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由于对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挫折。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以外，主要的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结合起来。王明等人颠倒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甚至提出过“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保证”这样的口号。

      对于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等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中共中央主持工人运动工作的刘少奇多次提出过反对。但王明对不对他们随声附和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委员、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红军的领导权。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错误的批评。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1933年初，由于白区党的工作遭到破坏，临时中央政治局无法在上海立足。为了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他们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矛头都是对着毛泽东的主张。

      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项英、陈毅等率领中央根据地留下的部分红军在南方坚持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二、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其后，1935年3月、4月，红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长征。同年11月，红二、六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长征。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开始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时独立地作出的。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它一方面损害党的事业，损害人民利益；另一方面又从反面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同5月初离开川陕根据地实行转移到达那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又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先行北上，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初，在甘泉地区同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毛泽东说过：“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重要的是在困难时不要动摇。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是党和红军的精华。中国共产党依靠这支队伍作基干，使革命力量恢复、发展、壮大。

      中国共产党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惜付出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精神。

**三、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民族抗日战争**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1936年12月，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

**第一节 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

      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控制本国政权。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宣示了《对华政策纲要》，企图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割出去。日本成为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1929年10月，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加紧实施侵华政策。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的小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分别向沈阳城内和长春、四平街、公主岭等地发起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阶段由此开始。1932年2月，中国东北全境沦陷。日本侵占了山海关至黑龙江之间相当于日本本土3倍的11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蒋介石在1931年7月已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开始入侵中国华北地区。1935年，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使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中国政府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华北成为日军可以自由岀人的“真空地带”。接着，日方又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两市（北平、天津）“防共自治运动”，制造傀儡政权。这就是华北事变。

      国民党政府将军队主力用于“围剿”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国际联盟和英、美等国政府则采取对日姑息、纵容的政策。

      卢沟桥事变与华北事变后，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部署。1936年8月，法西斯军人控制的广田弘毅内阁制定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先打中国”的侵略计划。11月，日本同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欧亚两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了反动同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当夜，驻丰台日军一个中队在卢沟桥以北举行军事演习。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城，向卢沟桥的中国驻军进攻。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动员全部军事力量，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向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发起进攻。日军占领了北平（今北京）、天津、太原、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

     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以后实施“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策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进行“扫荡”。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占领2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开始了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在台湾设立总督府。日本驻台总督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于一身，并负责指挥驻台的日本军队。总督府主要官员都由日本人担任。他们建立了一整套警察制度和保甲制度，还进行经济掠夺。他们推行“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殖民经济模式，使台湾成为日本的稻米供应地。殖民当局还推行奴化教育和同化政策，开展“皇民化”运动。

      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开始了对东北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1932年，在日军扶持下拼凑的伪“满洲国”（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两年后改称“皇帝”），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复辟残余势力催生的一个怪胎。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拼凑了一些地方性傀儡政权。1938年12月，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关内占领区，日本军国主义者允许“中华民国”国号存在，但这些地区实质上是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和在中国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

      首先，制造大屠杀。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展开烧、杀、淫、掠“大竞赛”，开始了“南京大屠杀”。日军对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实行“杀光其居民、烧光其房屋、抢光其粮食”的“三光”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在晋冀鲁豫、山东、苏皖等7个根据地，中国军民被杀戮者达318万人，房屋被焚烧1952万间。日军对中国军民实行人体活体试验。从1940年下半年起，日军的731部队等开始将带有霍乱、伤寒、鼠疫等病菌的投掷器投放到中国许多地区。日军还强迫一些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其次，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在东北，在“日满经济一体化”的口号下，日本的垄断资本独占了全部重工业和铁路交通。在关内，按照日本“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原则，被毁的中国工厂约占当时工厂总数的37%。华北煤产量的65%被运往日本。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占领区的土地及农产品。他们强迫农民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廉价出卖给伪政府。

      再次，日本侵略者按照“思想战”的方针，大力推行奴化教育。

**第二节 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

**一、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共中央揭露日本侵占东北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号召全国武装进行自卫。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

      中共中央以及东北党组织先后选派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加强中共满洲省委及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力量。中共满洲省委派出大批党员、干部到抗日义勇军中工作。1933年初，抗日游击队先后在东北各地崛起。1934年，各抗日游击队先后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以后，又陆续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

**二、抗日救亡运动和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

     工农红军和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上海、天津、广州、北平等地工人纷纷举行反日大罢工和抗日示威游行，募捐。冀东农民打游击等斗争。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大中学生举行罢课、示威、街头宣传。各地学生还到南京要求蒋介石出兵东北。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与民更始”，变更“剿共”政策。

     在东北，中共满洲省委同以原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义勇军进行合作。其领导人李杜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抗击进攻上海的日军，中共中央发动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罢工。

      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谋求同共产党合作。在同盟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约有300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同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以及国民党内爱国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发动反蒋抗日事变。这就是福建事变。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代表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事变失败后，共产党人同李济深、蔡廷锴等爱国人士继续保持着联系。

      1934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领衔，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

**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游行，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举行了示威游行。这就是一二·九运动，标志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到来。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年10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岀版的《救国报》发表，呼吁全国各党派应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

      1936年5月，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共产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进展。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已停止敌对行动。

     蒋介石开始试探“政治解决”共产党和红军问题的途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进行初步磋商。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了反蒋的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提岀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蒋介石仍准备组织力量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他于1936年12月初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攻打陕甘的红军。12日凌晨，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介石“哭谏”无效后实行“兵谏”。这就是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并参加张、杨同南京方面代表宋美龄、宋子文的和平谈判。蒋介石被迫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如果国民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许多人要求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四、全民族抗战开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

      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不久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等协议。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O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共4.6万人。接着，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1.03万人。9月，原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投入抗日洪流。民族工商业者为前线捐赠钱物，一些人把工厂迁往大后方。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抗日。宋庆龄从上海移居香港，于1938年6月成立保卫中国同盟。

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进行大小战斗870多次，歼敌3.76万余人。许多台湾同胞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岛内的高山族等台湾同胞发动抗日暴动，组织抗日义勇军（台湾同胞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抗日斗争中，共有65万人壮烈牺牲）。香港、澳门同胞积极支援内地的抗战。

      在亚洲，新加坡成立了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仅在全民族抗战的头三年，海外侨胞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000余辆，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大批海外华侨还回国投身抗战，仅粤籍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

**第三节      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一、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中国处于防御阶段。

      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侵略者以国民党军队为主要作战对象。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军队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战役。1938年3月，李宗仁等部进行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

      在北平南苑的战斗中，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在淞沪会战中，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率孤军据守四行仓库（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家银行共同出资建设的仓库），被上海市民誉为“八百壮士”。

      在这个时期，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是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但是，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外，其他战役几乎都是以退却、失败而结束的。造成这种状况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日军占很大的优势；主观原因，则是国民党战略指导方针上的失误。蒋介石集团害怕群众的广泛动员危及自身的统治，因而实行的片面抗战，即不敢放手发动和武装民众，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上；在战略战术上进行阵地防御战。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上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中国西部大部分地区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实际管辖区，人们通常称之为国民党统治区（又称大后方）。

      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实行过有利于抗战的政策。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聘请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同年6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国民参政会是受国民党控制的最高咨询机关，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开发表政见的讲坛。国民政府对经济行政机构也进行过调整，只是机构膨胀的情况未得到根本改变。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东部沿海地区一批重要工厂企业迁移到内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分别由北平、天津迁往昆明，合并组建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上海等地还有其他一些大学、中学、专科学校迁往西南的重庆、遵义等地以及西北的一些地方。

**二、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标志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

      日军在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继续对国民党军队发动过进攻性打击。国民政府大体上保住了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1939年12月，在桂南会战中，以第五军为主力的国民党军队曾攻克昆仑关，消灭日军4000余人。1940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激战中殉国。这个时期国民党实行保守的收缩战略；同时抽岀兵力用来限制、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对日宣战。不久，美国提议设立中国战区。国民政府命令各战区发起攻击。1942年元旦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死伤5万余人。同年2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陆军第二OO师师长戴安澜在缅北殉国。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的有利条件下，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日益下降。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在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遭到大溃败。军队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146座大小城市、6000万人口的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方面在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方面又扩张官僚资本；一方面宣称实行“民主”，一方面在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豫湘桂大溃败成为人心变动的重要转折点。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确信，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坚持抗战。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必须改革政治机构，给人民抗日民主权利，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会议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发动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

      在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进行人民战争主要是要深入敌后，组织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政权，把农村建设成为革命阵地。中国共产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农村，在新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1938年5月至6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指岀，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战争。一方面，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决定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另一方面，日本是小国发动侵略战争，失道寡助；而中国是大国，进行反侵略战争得道多助。因此中国会胜利。

      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胜日本的侵略，必须进行人民战争。

      毛泽东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即：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

**二、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及其战略地位**

      八路军刚开赴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取得全民族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接着，又参加忻口会战。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雁门关以南伏击日军，第一二九师还以一营兵力担任主攻，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毁伤敌机20多架。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开辟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山东和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新四军则挺进长江南北，开赴苏南、皖南、皖中地区，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多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到近20万人。到1940年底，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还建立了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根据地（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南、皖中、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加上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拥有1亿人口。1944年春季，敌后战场人民军队转入攻势作战。他们已经抗击着全部侵华日军的64%。

      民族英雄涌现出，如以身殉国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等抗日将领，以及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日联军八位女战士等。

      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游击战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主要的，敌后的游击战是辅助的。但是，游击战迫使敌人把用于进攻的兵力抽调回来保守其占领区，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

      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日军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1939年至1940年，华北地区的日军出动千人以上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就有109次，使用的总兵力达50万人以上。人民军队在有利条件下也进行过运动战。如1940年8月至12月初，八路军总部调集100多个团共20万人，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场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战役。这就是百团大战。

      在1945年8月反攻阶段到来前夕，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到120万人、民兵扩展到220万人，抗日根据地达到了19块。敌后军民的大反攻，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全国各地的革命抗日武装力量，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

**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阶级利益，抗战目的不同，实行不同抗战路线，内部存在矛盾。

      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为此，共产党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发动群众；必须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保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取得的阵地些阵地。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侵犯陕甘宁边区，并在山西、河北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皖南以8万余兵力包围袭击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多人（除约2000人突围外，一部分被打散，大部牺牲或被俘）。蒋介石还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番号，这就是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1943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及时制止。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进步势力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战争的主要力量。发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装，创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抗日运动。

      中间势力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争取中间势力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共产党要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是要同顽固派作斗争，并取得胜利。

      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即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他们采取两面政策，既主张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他们，即贯彻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斗争不忘统一，统一不忘斗争，以统一为主。

**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方针。

      加强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地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赞成民主的人们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边区（省）、县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立法机关；边区、县、乡抗日民主政府是行政机关；边区高等法院和县法院是司法机关。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1/3，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阶层。

      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努力发扬政治民主，保障人民民主自由权利。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等专门通过有关保障人权的条例。

      毛泽东在回答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岀“其兴也浮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历史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时讲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各地抗日民主政权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减租减息（地租，按原来租额比例，减低25%;战前借贷，以15%为计息标准）；同时实行交租交息。

      抗日民主政府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发动农民组织；帮助农民改良耕作技术。

      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岀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等亲自参加生产。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为“陕北江南”。抗日民主政府还厉行精兵简政。

      文化建设与干部教育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中共中央吸收知识分子，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等。各根据地还创办了大量的中、小学校，吸收农民子女入学。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也得到重视。1940年8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

     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人员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也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

**五、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是在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促进团结抗日等方面的大量工作。

      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是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具体领导。1939年1月以后，由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具体领导。

      全民族抗战后，各界人士要求国民党实行抗战民主。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一些党派的代表发起宪政座谈会，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起来。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派人到香港开展工作，得到中共南方局所属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的支持,并于同年9月创办了盟报《光明报》。

      1944年9月，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公开反对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准备发动内战的反动方针。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文化界抗敌协会成立，成为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标志。

      1938年初，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以后，掌管宣传工作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由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在周恩来、郭沫若的参与和领导下，团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爱国人士，成为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文化工作的重要阵地。第三厅组织了包括儿童剧团在内的十多个抗敌演剧队、宣传队，分赴各个战区进行抗日宣传。

      武汉失守前后，一大批文化界人士迁移到重庆和桂林、昆明等地。中共中央南方局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大后方的进步文化工作。文化界提岀“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

**六、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共产党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毛泽东抵制。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

      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岀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他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带着中国的特性。”他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而代之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

      针对国民党借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的时机，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等论调，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他们“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著作。

      毛泽东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生及发展的原因。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共和国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济上,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存在。文化上，废除封建，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即民族科学的大众文化。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武器。而党的组织是实行对敌的英勇战士。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党的路线已走上正确轨道，但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从思想上进行清理。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开展了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整风运动先在高级干部中进行。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普遍展开。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

      主观主义的实质是理论脱离实际，是唯心主义。当时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内反复出现“左”、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个成语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成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通俗而又生动的表述。

      毛泽东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岀《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区委、省委或工委也成立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

      在整风运动中，全党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开展自我批评，端正了思想路线。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深刻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他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

      1945年4月2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七大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七大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命名为毛泽东思想。

      同年6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第五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原因和意义**

**一、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5月上旬，苏联攻克柏林，德国投降。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8月上旬，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攻击日本关东军。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对于不愿投降的侵略者进攻。中国人民军队对日军的战略反攻全面展开。

      8月14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在东京湾美军军舰密里号上举行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余人向中国投降。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根据波茨坦公告，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由中国收回。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抗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已开始。从1937年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到1939年9月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前，中国人民抗击了日军的进攻。中国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力量；同时也推迟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你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苏联元帅崔可夫说：“在战争年代里，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

      中国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

      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抗击日本陆军的80%左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仍抗击日本陆军的半数以上。从1931年9月至1945年9月，中国军民共歼灭日军150余万人。

      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世界上所有爱好正义的国家、国际组织及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

      苏联是最早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援助的国家。1937年8月，中国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并派遣空军志愿队。抗日战争后期，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打败日本侵略者。

      美国对日本奉行绥靖政策。之后美国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另一方面又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支持中国、联合中国共同抗日。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陈纳德曾组建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来华对日作战，并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而开辟驼峰航线。

      英国及法国等国也向中国提供了经济援助或与中国进行了军事合作。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39年11月，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被感染去世。

**三、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和意义**

      第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第二，中国共产党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倡导和推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

      第三，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人民，提出并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

      第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中华民族由近代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

      第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中国迫使日本归还甲午战争从中国窃取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桿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第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人民为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作岀贡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以弱胜强的范例。1945年4月，中国同美国、英国、苏联发起旧金山会议，共商建立联合国。随着《联合国宪章》正式岀台，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人民认识到：只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振兴。

    中国共产党曾经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的改革。由于人民力量强大，中国共产党估计，造成国共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45年5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提出，对蒋介石拟采取“洗脸”政策而不是“砍头”政策。8月24日，毛泽东指岀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中央考虑同国民党进行谈判。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提岀“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毛泽东于8月28日偕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10月10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政协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38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密切合作。

      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政协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改组后的政府为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中央政权的这种体制相当于英国、法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中央同地方分权，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等。

      政协会议的上述协议及其他协议，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协议较多地吸收了中间人士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是准备履行政协协议的。在政协召开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全党应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政协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全党要“准备为坚决实现（政协的）这些决议而奋斗”。同时，中共中央也指出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因此，必须注意“阵地的取得和保持”，而“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基础狭隘，这决定了它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后来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承认国民党存在着维护特殊利益的集团。国民党统治集团没有准备去履行协议。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命令追随者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他扩大内战。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方针是，先接收关内，控制华东、华北，而后进兵关外，以便独占东北。所以，它计划先在关内大打，而后在关外大打。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使各界群众懂得了什么人应当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时，代表团成员李维汉在日记中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但我党满载人心。”

**二、国民党发动内战和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全面内战爆发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内战。同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华北解放区重镇张家口。蒋介石于当天宣布11月12日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次年3月，国民党当局限期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及工作人员全部撤退。

      当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430万人，它占有3.39亿以上人口、73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它不仅接收了100余万日军和数十万伪军的装备，而且美国还为它训练和装备了50万军队。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为127万人，装备是缴自日军的步兵武器；解放区的人口为L36亿，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而且是被分割、包围的，在物质上得不到任何外援。蒋介石声称这场战争“一定能速战速决”。

      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

      毛泽东指出：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蒋介石发动的战争人心向背。

      中共中央指岀，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必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

      在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一年的时间里，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

      从1946年6月至10月，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城市153座；解放军则收复城市48座、歼敌29.8万人。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城市87座；解放军则收复和解放城市87座、歼敌41万人。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而改为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从1947年3月至6月，解放军经过4个月的内线作战，并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南等地开始局部反攻。解放区虽仍有95座城市被敌侵占，但解放军同时收复和解放了153座城市，并歼敌40余万人。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1947年7月，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它的大部分兵力用于守备，战略性机动兵力大为减少且士气低落。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00万人；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因大量缴获而得到很大改善,机动兵力大大增强。

      中共中央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有优势，将主力打到外线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它们调动和吸引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周围，迫使国民党军处于被动。

      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包括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也渐次转入反攻。同年夏季，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反攻，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老百姓和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要推翻他了。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毛泽东指岀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随后,他进一步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牢牢掌握党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善于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

**二、土地改革与农民的广泛发动**

      从“五四指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同时，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夕，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决定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有2/3的地区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全国土地会议后，广大农村迅速掀起土地制度改革（习惯称“土改”）运动的热潮。

      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到1948年秋，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并在政治上获得翻身以后，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落入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成立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争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

      土地制度改革，是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土改运动的发展表明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在深入发展。

**三、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也发展起来，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国民党政府由于独裁统治和贪污腐败，抗战后期在大后方已丧失人心。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收时，把接收变成“劫收”。巨额资产转归官僚资本集团占有，其中很大部分被官员个入侵吞。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后来也说过，国民党“容忍了各级官员的贪婪受贿、懒散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那个被它所推翻了的腐朽官僚制度的一切弊病它全都有了。为了摧毁共产主义，那些弊病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

      国民党之所以迅速失去民心，主要是由于它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国民党政府除了对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税以外，更无限制地发行纸币。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已比1937年全民族抗战前增发47万多倍，而物价暴涨了725万多倍，国民经济遭遇深刻的危机。1947年，工业产量较1936年减少了30%。失业人数陡增，农村经济急剧衰退。1947年，农作物总产量比1936年减少了33%~44%。广大农村饥民遍地。1947年，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生活也陷入极度的困境。

     1945年底，昆明学生发动了以“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主要口号的一二·一运动。

      1946年12月30日，为抗议驻华美军强暴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女学生，北平学生高喊“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退出中国！”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运动（史称“抗暴运动”或“一二三〇运动”）由此掀起。截至1947年1月10日，12天内，抗暴斗争扩展到14个省26个城市，参加罢课、游行等的学生总数达50万人。

      1947年5月20日，南京、北平等地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史称“五二〇运动”）。随后，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60多个大、中城市。

      在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1947年10月以后，爱国学生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抗斗争的浪潮。由于他们愈来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面,学生运动的主要口号便由“反饥饿、反内战”改为“反迫害”了。

      1948年，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逆转，开始由促使日本非军事化和整肃右翼，转向扶持日本，打击左派势力，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依靠。爱国学生提出“反美扶日”“挽救新民族危机”的口号。6月5日，上海学生举行反美扶日大游行。这个运动扩展到全国。

      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夜，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派出请愿团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时遭到当局指使的大批暴徒围殴达5个小时，团长马叙伦和代表雷洁琼等多人受伤。

      1947年间，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中，先后有120万工人举行罢工。5月到6月，饥饿的城市居民的“抢米”风潮席卷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四川等省的40多个大小城镇。

      1947年1月，民变地区扩展到300多个县。中共在广东（含海南岛）、湖北、安徽、福建、江西等一些地方的农村中，发展人民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抗议反动军警屠杀市民，举行示威游行。2月底3月初，台湾各地汉族、高山族人民举行起义，并攻占台中、嘉义等城市。国民党当局从大陆调来大批军警、特务，进行镇压。3月14日起义失败。

      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运动，于1945年建立革命政府。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派出代表团同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并于1946年1月初签订11项和平条款。但是，它很快就推翻和平条款。

      1947年初，内蒙古东部大部和中部部分地区获得解放。中共中央提岀“内蒙成立统一的民族自治政府问题”，强调“内蒙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承认内蒙民族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并愿为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之部分”。4月，在乌兰浩特举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等。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乌兰夫为主席。

      这些事实表明不仅在军事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战线上，国民党政府都打败仗。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指出：为了建立和平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准备一切条件。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一、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中国的民主党派，少数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7年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及其他国民党民主派酝酿成立联合组织，宋庆龄表示支持。同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第一次联合会议在香港召开。1948年1月1日宣布正式成立。民革中央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1年3月在重庆诞生。黄炎培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不久，改由张澜任主席。民盟由6个组织联合组成，它们是：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以及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为便于更多的民主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5年12月，由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发起在重庆成立。黄炎培、胡厥文等当选为常务理事。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45年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组成人员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岀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王绍鍪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会务由马叙伦负责。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1928年，谭平山、章伯钧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并开始发展成员。1930年8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告成立，邓演达为总干事（后被国民党当局杀害）。1935年11月，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1947年2月，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任主席。

      中国致公党。1925年10月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成立总部。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李济深为主席（对外未公开），陈其尤为副主席。

九三学社。1944年底以来，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举行座谈会（“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宣告正式成立。许德珩等当选为理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二二八起义失败后，1947年8月，谢雪红等在香港酝酿成立政治组织。11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成立。

      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党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纲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

      在战后进行国共谈判和召开政协会议时，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面”，主要是同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在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时，尽管参加民盟的青年党、民主社会党跟随国民党跑了，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人，在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和虚假的“多党政府”以及反对国民党炮制的伪“宪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是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

      中国共产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一些重大问题同他们进行协商。中国共产党支持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同时尊重和维护其应有的政治地位和合理的利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

**三、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中国的民主党派并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正如周恩来所说，“其组织成分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由于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他们不能不在克服某些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求得进步和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曾经鼓吹“中间路线”。他们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周恩来在当时说过：“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

      中间路线的鼓吹者主张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地主官僚资本家不准操纵；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但不容官僚买办。他们所提倡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道路。

      但持中间路线想法的人一接触到斗争，他们只能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

      国民党当局不仅极度仇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尽管民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以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遭暗杀之后，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盟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屠杀，多家报社也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5月，国民党公布伪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公然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受中共之命，准备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同年11月6日，民盟总部在上海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停止政治活动，总部亦即日解散”。

      新华社在为民盟被解散而发表的评论中说：“民主同盟是一个赤手空拳的组织，他们连‘一支枪也没有’，也不打算有，他们凭借的是言论，而这样的武器也被蒋介石没收了。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宣告，民盟“不能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环境。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布:“本会当前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自由、民主和平。它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从当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分别从香港、上海、北平及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等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北平解放后，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在北平汇合。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

      同年春，毛泽东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会议并将在新中国参政，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它们成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

      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第四节  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一、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胜利的决定性阶段。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解放区面积达到235.5万平方公里、拥有1.68亿人口，并且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相反，国民党军队则由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其中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在军事上放弃“全面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

      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辽沈战役自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1月2日结束，历时52天。东北野战军主力70万人在林彪、罗荣桓领导下，共歼敌47.2万人。淮海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6天。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以及地方武装共60万人，在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领导下，歼敌55.5万人。平津战役自1948年11月29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64天。人关作战的东北野战军、华北解放军主力与地方武装共100万人，在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领导下，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

      三大战役前后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154万余人，加上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期间在济南战役和其他战役中的损失，国民党军队共丧失兵力230余万人。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企图借“和平谈判”之机布置长江防线。1月14日，毛泽东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把握，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中国共产党愿意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从4月1日开始。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达1000多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摧毁国民党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延续了22年之久的国民党统治的覆灭。解放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所部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的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解决残余敌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逃往中国台湾省。

**二、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

      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性。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是不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新中国的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他说，我们“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这套东西“袁世凯、曹锟都搞过”，我们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告诫全党，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告诫全党，必须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全会做出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等有关规定。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他把进北平比作“进京赶考”，说“我们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

      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指岀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80%~90%。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他指出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

      毛泽东、中共中央进一步确认，中国不宜实行联邦制。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向政协代表报告时指出：今天帝国主义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62人。

      新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共同纲领》规定，在经济工作中，“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共同纲领》当时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是临时宪法。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备工作完成。

      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人民政协标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

**三、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中国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人民走上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步向共产党靠拢，这种现象曾经被人称作是“开万国未有之奇”。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华侨等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作用。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国民党左派何香凝等，与共产党站在一起。邓演达、李公朴、闻一多等，还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陈嘉庚**、司徒美堂等成了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它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间，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无数的优秀战士。它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苏兆征、彭湃、陈延年、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等，许多杰岀的将领，如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许继慎、韦拔群、赵博生、董振堂、段德昌、杨靖宇、左权、叶挺等，在这个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人以行动表明了自己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最能虚心体察民情并依靠群众的坚强的革命者。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确认的客观真理。1949年6月26日，留在北平的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在他所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中说：“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觉得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显露岀新的希望。”他说：“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欣慰。我们中国人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希望把国家搞好。”

      毛泽东说过，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没有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斗争，堆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可能胜利的；要巩固，也不可能。一些国际友人还参加中国的革命斗争，有的已经长眠。

      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它所提岀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指引下，逐步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毛泽东指岀：“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第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在中国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辅助的，是重要的。必须坚决依靠第一个联盟，争取建立和扩大第二个联盟。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率领同盟者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第二，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

      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才能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

为了发展中国革命，建立一支在工人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实行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第三，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着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注重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中国共产党首先着重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党员用工人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培育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等。

      遵循毛泽东建党学说，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了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时指岀：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

      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任务，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